

转型期社会中的“存在之思”——论李翊云 短篇小说中小人物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Thinking of Being” about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The Ethical Predicaments and Ethical Choices of Insignificant People in Yiyun Li’s Short Stories

王璐 (Wang Lu)

内容摘要：李翊云是著名的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目前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获得多项重要英语文学奖项和提名，在当代英语写作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李翊云的短篇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平凡小人物多样的生活状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将李翊云两部短篇小说集中悲剧式小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身份困境、精神困境等典型伦理困境进行分类阐述，并探讨这些非英雄式主人公们在不同伦理环境之中，在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多轮博弈之下作出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伦理选择。通过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小人物群像伦理境域的客观描写，李翊云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如何借助英文小说对母国文化和历史进行跨时空的观照和反思，如何以跨文化视角和世界公民意识对不同文化生态中的政治、权力、变革进行思考，如何对孤独、疏离、焦虑等人类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个性化表达。

关键词：李翊云；《千年敬祈》；《金童玉女》；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王璐，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加拿大华裔文学和北美华人新移民英语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批号：13&ZD128】，以及笔者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一般项目“北美华人新移民女性英文小说母题分化研究”【项目批号：GD16CWW10】和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2013年度青年科研项目“美国华人新移民女性英文小说研究”【项目批号：13JDQNXM00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inking of Being” about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The Ethical

Predicaments and Ethical Choices of Insignificant People in Yiyun Li’s Short Stories

Abstract: As a renowned Chinese new immigrant writer in the U. S., Yiyun Li has currently published two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two novels as well as a memoir, which earn her many literary prizes and a good reputation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Her short stories meticulously depict the diverse life styles and rich spiritual world of the ordinary peop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here undergoes a pervasive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elaborates in detail several typical ethical predicaments of the tragic insignificant people in Yiyun Li’s two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namely survival predicament, identity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predicament. It also discusses the rational or irrational ethical choices made by these non-heroic protagonists due to being driven by the multiple games between their rational will and free will in different ethical environments. By objectively portraying the ethical horizon of these insignificant people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Yiyun Li shows the western audience how Chinese new immigrant writers in America profoundly introspect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ir mother country in virtue of writing novels in English, how this group of writers ponder over such topics as politics, power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ross-cultural standpoint, and how they express loneliness, estrangement and anxiety in their unique ways, which belong to the common deep cultural mentalities of the whole human being.

Key words: Yiyun Li;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Gold Boy, Emerald Girl*;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choice

Author: Wang Lu is Lecturer at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nd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y Chinese new immigrant writers in North America. Email: wanglu34@sina.com

李翊云（1972-）是著名的美国华人新移民女性作家，主要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1996年她赴美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2000年开始弃理从文，先后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2005）、《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 2010），两部长篇小说《漂泊者》（*The Vagrants*, 2009）、《比孤独温暖》（*Kinder Than Solitude*, 2014），以及一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 2017）。李翊云曾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

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怀丁作家奖、麦克阿瑟“天才”研究基金、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本杰明·H.丹克斯奖”等多项大奖，曾担任美国国家图书奖、布克国际文学奖等评委，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她在当代英语写作世界，尤其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其成名作《千年敬祈》聚焦社会转型中草根阶层的精神世界，集中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的社会变迁，收录的十个短篇如多棱镜般从不同侧面透视主题，共同折射出在现代化进程上日益演变的当代中国图景，呈现了“令人心碎的诚实”¹，展现了“令人钦佩的驾驭短篇小说的能力，是一部富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的小说集”²。《金童玉女》收录了一个中篇和八个短篇，着力表现20世纪九十年代后走向城市化、全球化的中国，侧重描写小人物内心的孤独与疏离，却寄望于表现人性之爱来憧憬未来，基调朴实温暖，写作题材和风格既承接前作又有所突破。

国内对李翊云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多停留于评介，深入的评论只寥寥几篇，这显然与其近年来所取得的文学成绩和国际声誉不相匹配，也与学界对汤亭亭、任碧莲、哈金等美国华裔/华人作家的火热研究形成较大反差。李翊云的小说聚焦平凡小人物的生活，反映其多样的生存状态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其深厚的人文关怀特质尤其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将李翊云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小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进行分类阐述，探讨他们在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多轮博弈下作出的不同的伦理选择，并分析李翊云等美国华人新移民作家如何借助英文小说在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多元背景下回忆原乡和回望故国，如何超越时空地反思母国的历史和文化，如何在书写特殊个体中展现普世价值。

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视野开阔，跨越了国土疆域、城乡二元、历史时空、现实与虚构等边界，笔触游走于政治革命、经济剧变、法理冲突、性别错位、宗教信仰、神话寓言、代际隔阂等各方面。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阐述“社会转型”理论的社会学家李培林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开放，国家的物质文明空前繁盛，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质的飞跃；然而社会转型时的剧烈变革同样也带来了物欲膨胀、文化衰退、精神凋敝和道德滑坡等各种负面影响，使道德主体陷入种种困境。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中，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它“往往是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聂珍钊 258）。李翊云的两部小说

1 See Stella Dong. "Song of Pro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Jan. 2006. 5.

2 See Sarah Crown. "Inaugural Short Story Award Goes to Debut Author," *The Guardian*. 26 Sep. 2005. Web.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5/sep/26/news.awardsandprizes>>. 10 June 2017.

集描摹和展现了小人物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主要表现为生存困境、身份困境、精神困境三个层面。

一、社会剧变中的生存困境与非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从伦理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¹。在这新旧交替、变动不居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经济、政治、法制、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巨大变化，老百姓们常无所适从。小说《多余》（“Extra”）通过林奶奶（Granny Lin）“失业—结婚—失婚—再就业—又失业”的故事，生动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下岗工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纺织女工林奶奶在快速席卷而来的经济改革浪潮中，不断被推向新生活，几个月内接连遭遇三次生存危机。第一次是单位突然内部改制，她被提前退休却领不到退休金，成为国企改革中的“多余人”。第二次是她迫于生活压力嫁给退休教师老唐（Old Tang），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但却仅被视为照顾患病丈夫的免费保姆，老唐意外身故后她成为丈夫家庭的“多余人”。第三次是她到贵族学校当清洁工，因孩子恶作剧被学校遣离，在熙攘的大街徘徊时被人抢了行李，彻底沦为社会的“多余人”。小说开头和结尾处出现的不锈钢饭盒遥相呼应，寓指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在轰轰烈烈的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中，无数工人丢掉了手中的长期饭票，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背后，有一群林奶奶式的普通下岗工人被新的经济体制抛弃，既缺乏现代技能傍身，又没有家世背景支持，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

政治变革也是小人物陷入生存困境的重要诱因。《玩笑》（“Death Is Not a Bad Joke If Told the Right Way”）中的庞先生（Mr. Pang）就是在政治变革中不能接受自己社会伦理身份改变、无法适应新生活而陷入生存困境的悲剧式小人物。庞先生解放前出生于富贵之家，风花雪月、游手好闲，解放后人生境况一落千丈，家产被充公，因成分问题被单位开除，生活每况愈下，衣着邋遢、沉默寡言、举止怪异。庞先生由一个锦衣玉食的“贵族子弟”沦为杂院里的贫民，饱受了妻子的冷眼和邻居的嘲笑，后来经人介绍在出版社当临时工，勤勉工作16年却难逃命运所开的玩笑：被抢劫的歹徒刺死。庞先生性格及命运发生极大转变的原因在于接踵而来的解放、土改、文革等一系列社会政治体制剧变给他带来巨大心灵创伤，他无力应对。小说在时空交错中勾勒出北京四合院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图景，其笔墨重点落在描绘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飞速增长、新旧体制交替、外来文化入侵、工人下岗失业、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普通百姓造成的心理冲击与影响。

社会转型中伦理体系与法理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导致小人物陷入生存困

1 参阅雷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14。

境，这在农村地区尤为典型。《柿子》（“Persimmon”）深度刻画了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法理”之间的尖锐冲突中，农民“老大”（Lao Da）在面临生存困境无法解决时引发的人性扭曲。“老大”5岁的儿子因嘲弄前来水库钓鱼的县城官员，被扔进水里淹死了，妻子听到消息后喝下农药随着儿子赴了黄泉。“老大”突然遭遇丧子丧妻双重打击，一方面“为妻、为子报仇”、“杀人偿命”等传统伦理观念在其脑海里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在现代法制社会中他又不得不服法律约束、服从法庭审判，因而陷入困顿的“两难处境”。

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聂珍钊 267-68）。小人物在面临伦理困境走向伦理选择时，其内心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在进行不断角斗、抗争和抵牾，其伦理选择则是两者不断博弈后谁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在面对经济剧变、政治革命和法理冲突等因素导致的生存困境时，随着生存压力激增、外界刺激加剧，小人物身上的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对抗不断加强，自由意志往往尽力挣脱理性意志的束缚，当他们无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时，就会选择错误的伦理立场、作出错误的伦理判断，从而导致悲剧发生。

有时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博弈时间非常短。当遭遇剧烈的外界刺激时，内心强烈的情感冲动会激发自由意志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行为的绝对自由，理性意志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因此道德主体会作出鲁莽轻率的非理性伦理选择。《柿子》中“老大”妻子是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恪守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认为自己为人妻的天职就是生儿子传香火，民族积淀的伦理观念已内化成其心理潜意识，当遭遇儿子身亡的重大打击时，她只想到自己无法再生育，愧对丈夫和先祖，自由意志驱使她吞服农药自杀，以便腾出位置让丈夫续娶生子、传宗接代。她还未理性地思考其自杀行为的后果就草率、任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多数情况下，伦理选择往往是道德主体身上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多轮博弈后的结果。“老大”在一天之内接连遭遇丧子丧妻惨事，内心悲恸的情感驱动自由意志发生作用，结集村民带上锄头斧子去县里讨说法，却受到地方军队驱赶，他意识到在法治社会仅凭武力无法解决问题，理性意志让他收敛了暴力维权行为，转向斥诸法律手段。他状告肇事官员，可法官却判其无罪，随后再上诉也毫无结果。这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终于万忍成钢，选择了极端的反抗形式，在除夕之夜潜入县城，枪杀了17名相关官员，酿成惨绝人寰的社会悲剧。小说的伦理环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当时国家的法制法规还很不健全，不少乡镇干部仍保留着封建社会官官相卫的处事遗风，认为通过武力恫吓以及装腔作势的审判就可以欺瞒村民。整个事件中，如果县里的法官能秉公执法，“老大”不至于心理崩溃，身上“趋恶”的自由意志完全遮蔽了“求善”的理性意志，强烈的复仇情绪冲昏了他的头脑，最终造成骇人听闻的恶性社会惨案。该小说有力地鞭挞了重男轻女、官官相护、

法制不公等社会现实，提供了深刻的道德警示，让读者在对“老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反思造成其非理性伦理选择的社会环境动因。

道德个体在面临生存困境时，除了作出理性或非理性的伦理选择之外，还可能因价值迷失、身份焦虑或主体性缺失而精神迷茫，无法作出当下的、即时的选择，笔者称其为消极延宕的伦理选择。《多余》中的林奶奶每次生活境况的改变都不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动地接受生活的安排。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其主体性严重缺失，无法对生存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应对，才会在令人眩晕的社会剧变中迷失方向，无法走出困境的牢笼。林奶奶是社会变革的被动接受者，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代表，小说通过描写林奶奶下岗后的波折际遇，让读者走进那代下岗工人面临体制改革的迷惘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消极延宕的伦理选择可能只是暂时的状况，当伦理环境发生改变时，道德主体会产生新的心理动向，重新做出新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受理性意志或者自由意志的主导支配，最终作出理性或者非理性的伦理选择。

二、性别错位下的身份困境与理性选择

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中有不少故事关注同性恋人群的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他们的特殊身份隐藏在“地下”，因不容于中国传统伦理而难以见光，所以他们从不轻易向外人、朋友甚至最亲密的家人公开自己的性别身份。“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63），而同性恋人群身份的隐蔽性是其伦理困境生成的根本原因。《儿子》（“Son”）中，美籍软件工程师韩 (Han) 是未“出柜”的同性恋者，一直戴着不同的“人格面具”过着“地下”生活，因为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同性恋行为都受到严厉的社会规训和惩戒。他表面看来工作体面，衣着光鲜，追求个性和高品质生活，但因为同性恋人群所遭受的歧视和压制，他无法信任别人，常在深夜上网用多个账号扮演不同的身份与人聊天，表现出人格分裂的倾向。《金童玉女》中的同性恋者韩枫 (Hanfeng) 也曾在纽约、温哥华等北美各地放纵自己，四处寻伴，无法保持稳定的恋情。其母戴教授 (Professor Dai) 也是隐秘的女同性恋者¹，母子俩严守着各自错位的性别身份，因无法言说的情感秘密备受困扰。《内布拉斯加公主》（“The Princess of Nebraska”）中，博深 (Boshen) 虽然勇敢地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积极维护同性恋群体的权益和宣传预防艾滋病，但却因此受到严密监控的惩罚。随后他与刚取得美国身份的女同性恋朋友假结婚去了美国，但这种形式上的异性婚姻却让他背负了背弃同性恋人的恶名，也使他遭遇了社会身份降格、与爱人分离等困境。

1 See King-Kok Cheung, “Somewhat Queer Triangles: Yiyun Li’s ‘The Princess of Nebraska’ and ‘Gold Boy, Emerald Girl,’” *Critical Insights: Contemporary Immigrant Short Fiction*. Ed. Robert C. Evans (Ipswich: Salem Press, 2015) 88-103.

除了性别身份的不可言说性，男同性恋者常面临“自我”与“儿子”双重伦理身份悖论的困境。韩虽然很孝顺，每年给母亲丰厚的赡养费，定期回国探望陪伴，但多年在美国的生活让他变得独立思考、开朗健谈、追求自我价值，他既不愿为了尽孝而相亲结婚，也不愿向母亲坦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从而陷入两难处境。韩也无法悦纳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潜意识深处一直在“做儿子”、“做父亲”和“做自己”的身份悖论中挣扎。同样，韩枫厌倦了长期漂泊海外的生活而回国，与母亲的学生思雨(Siyu)相亲，一方面要面对自己真实的性取向，另一方面要履行对年迈母亲的责任和承诺，“自我”和“儿子”双重身份矛盾对立，构成难以调和的伦理悖论。

一旦同性恋者涉及双性情感，其性别身份的错置性和复杂性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博深的同性恋人阳(Yang)是京剧男旦，常在戏中反串公主，因而性别身份模糊，先后与博深和女大学生莎夏(Sasha)产生恋情。作为男旦，阳从小接受各种训练去模仿女性的音容举止，如观音一般呈现“男身女像”，过度的职业规训导致他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困惑迷茫：与博深同居时，他“像自己在台上所饰演的最贤德的女子”(Li, "The Princess of Nebraska" 73)，等待着博深帮助他重返舞台；当博深自身难保时，希望破灭的他转向莎夏处寻求安慰，从被动到主动与莎夏产生恋情；可当莎夏再三邀请他一同赴美时，他又转向以生理的、家庭的、社会的男性身份拒绝她：“我去美国做什么呢？被你当金丝雀困着吗？……没有什么比靠当女人的寄生虫来生活更能羞辱一个男人了”(Li, "The Princess of Nebraska" 88)。阳从同性恋逐渐演变成双性恋是其生理的、职业的、社会的、心理的性别身份发生严重错位的结果，他与莎夏的恋情也直接导致莎夏在美国求学时面临未婚先孕的窘困处境。通过这段离奇的三角恋故事，李翊云用犀利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同性恋人群纠葛、复杂的内心情感和伦理困惑，并且展现出作家对性别身份的表演性和流动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李翊云笔下的同性恋者在面临性别身份困境时虽然犹豫、纠结，但经过内心的斗争后其理性意志大都能战胜自由意志，对自己纠葛的伦理身份作出正确的认知，进行理性的伦理选择。韩以往回国总以学业、事业、前途等各种借口搪塞，逃避与母亲谈论结婚生子。这次回国他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再无借口，面临是否向母亲摊牌的抉择。据实告知，他怕母亲遭受打击；顺从安排，他又不愿委曲求全。在这种矛盾、郁结的心理驱动下，自由意志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叛逆情绪，不断与母亲产生口角冲突：批评她的政治信念，嘲讽她的宗教信仰，挑剔她的为人处事，甚至把母亲为他定制的受难耶稣十字架丢进箱底。当目睹乞儿兄妹遭遇车祸时，他偏执地把被撞死的乞儿想象成男孩，他认为只有这样，这个被父亲利用来行骗的乞儿才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才会和他自己一样，或像耶稣一样固化于儿子的身份，永远无法成为父亲。耶稣的隐喻和“男”乞儿的悲惨结局显然就是韩在面临性别身份困境时，

抑郁苦闷、内心冲突到极点的精神写照和情感宣泄。但韩冷静的理智最终战胜了他悲怆的情感，等母亲安全穿越马路来到他身边后才艰难地向她坦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其实母亲早已猜到真相，所以不再安排他相亲，并期望通过宗教信仰以求儿子幸福，母子双方最终在真诚的对话中达成理解和共识。

《金童玉女》和《内布拉斯加公主》中的主人公们也试图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各自面临的身份困境。韩枫回国后在与母亲的相处中学会了理解和包容，音乐汇演上母亲呈现出的衰老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决定承担起儿子的责任，“庇护她不受这个世界敌意的伤害” (Li, “Gold Boy, Emerald Girl” 209)。韩枫在与思雨的约会中，发现她与自己身世相近，决定顺从母亲的心愿，与思雨结成符合中国传统婚恋观的“金童玉女”般的夫妇。在订婚晚餐上，思雨想象着自己凭栏倾听韩枫和戴教授四手联弹钢琴，希冀有一天自己能取代戴教授，和丈夫韩枫一起演奏和谐而幸福的乐章。韩枫、思雨和戴教授都是这个世界上孤单的个体，他们选择用这种特别的三人相处方式，“去开创一个能慰藉他们孤独心灵的新世界” (Li, “Gold Boy, Emerald Girl” 221)。莎夏因即将赴美留学而内心迷惘焦灼，她任性地与阳开始了短暂的恋情，一厢情愿地想纠正阳扭曲、错乱的性别身份，却让自己陷入意外怀孕的窘境。她害怕自己像母亲一样被孩子羁绊和拖累，于是去找博深商量堕胎的事宜。对于博深的提议：与阳结婚把他带出国，他们三人一起抚养孩子，莎夏一开始断然拒绝，后来被腹中孩子的胎动所感动，几经思量决定生下孩子。依照小说结尾莎夏对胎儿去留的选择，博深、莎夏和阳可能将在美国开创三人共处的新型家庭模式。正如存在主义哲学耆宿萨特所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 (6)，因此当韩枫选择与思雨相亲、结婚，莎夏选择在美国生下孩子，他们也为事件中的三人群体作出了共同的选择。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乔治·摩尔认为，“当我们断言一行为是最好的做法时，我们就断言这一行为及其后果一起所提供的内在价值的总和，大于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 (28)。显然，在《金童玉女》和《内布拉斯加公主》中，主人公们试图建立三人新型家庭模式的选择能够为故事中所有人的情感利益提供最大的内在价值总和，是理性的、最佳的伦理选择，并能为我们整个人类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同性恋情感问题时提供自我完善的伦理道德范例与经验。

三、价值失范引起的精神困境及伦理选择

在社会转型中，国家和社会面临“旧的社会规范”与“新的价值体系”交错并立，且“常常伴有新规则的暂时缺位而呈现出价值失范的局面” (胡发贵 151)，因此道德个体往往混乱迷茫、举步维艰，深陷精神困境，主要表现为信仰危机、价值观冲突和代际隔阂等方面。

“信仰危机是当今世界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迷失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在

不同的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精神生活问题”（杨桂华 293）。早在“五四”时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已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超稳定”封建社会结构，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遭受到巨大的冲击。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思潮和宗教教派带着各自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取向不断侵蚀传统的儒家道德信仰和以共产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政治信仰，形成广泛、全面的信仰危机。这种深度的社会信仰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困扰在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里随处可见。《此生之后》（“After a Life”）中，方先生 (Mr. Fong) 目睹股市散户无法盈利、只能被圈钱时，开始质疑“股市在这个国家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如何解释这一全新的、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 (Li, “After a Life” 26-27)。《儿子》中的信仰危机表现为多元价值观念对民众精神生活的渗透以及盲目的宗教信仰趋热现象，韩的母亲从绝对听命于丈夫到将儿子的话奉为圭臬再到视耶稣为救世主，展现了社会转型中普通民众信仰观混乱的精神迷失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经济成分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的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取向的趋势。不同的道德主体相遇交往时容易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冲突，从而使道德主体陷入精神困境。《囚牢》（“Prison”）中移民美国的宜兰 (Yilan) 夫妇，因女儿意外身故回国，在乡下找了女子扶桑 (Fusang) 代孕。宜兰夫妇代表了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认为胚胎来自他们夫妇，他们出钱购买扶桑的代孕服务，双方是契约关系，“代孕母的作用仅仅只是生物孵化器” (Li, “Prison” 109)，扶桑背后的家庭悲剧与他们毫不相干，因而无需帮助扶桑赎回被拐卖的儿子。而扶桑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认为自己有权决定腹中双胞胎的生死去留，并以此要挟宜兰夫妇去赎救她的亲生儿子。宜兰夫妇和扶桑因立场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激烈的矛盾，双方信任的天平被打破，宜兰和扶桑作为孩子的基因母亲和代孕母亲，同居一屋檐下却陷入了互相为对方编织的精神牢笼。

《千年敬祈》中主人公的精神困境源于父女两代人因时代、地域等伦理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代际隔阂和冲突。退休科学家石先生 (Mr. Shi) 从北京来美国探望刚离婚的女儿，他发现自己与女儿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女儿不愿陪伴他旅行，不吃他做的饭菜，劝说他早日回国，更不愿向他敞开心扉交流思想和情感。其实，女儿的沉默源于长期以来父权制下压抑的家庭关系，她在出国后蜕变成一个全新的个体：主动选择离婚，并与罗马尼亚男友开始一段跨种族的新恋情。面对女儿的冷漠，父女之间心灵上鸿沟应该如何来修补和弥合，石父百思不得其解。小说围绕着石父在美国遭遇的精神困境深刻地探讨了跨国别、跨文化的代沟、婚姻、语言和信仰等问题。

面对精神困境，李翊云笔下的某些小人物能运用理智去控制其情感、欲望、直觉，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石先生努力从各方面去表达对女儿的爱：得知女儿离婚的消息，他不断去电话劝慰并赴美探望；珍惜与女

儿相处的机会，找话题与她聊天，提出陪她散步、观影和旅行；每日为女儿精心烹制晚餐并不断为她布菜。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段关系都有其存在的缘由” (Li,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192)，而父女关系则是双方修炼千年才得来的缘分，每日的烹饪化为他向上天诚心祷告、借以修补父女关系的仪式。女儿行为冷淡时他毫不气馁，女儿言语顶撞时他也尽力忍让，心情压抑时便去公园与一位讲波斯语的伊朗女子聊天，尽吐心事、排解压力。在与女儿的多次沟通甚至争吵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女儿已在新环境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现代女性，他的理性意志最终掌控住他深厚的父爱情感，于是决定回国，从女儿的新生活中退场，给予她想要的自由。

然而，也有些小人物在面对精神困境时，内心的“善”与“恶”激烈交锋，自由意志脱离理性意志的控制、压制理性意志的作用，从而导致小人物作出错误的价值判断、选择错误的伦理立场。这种情形在小说《囚牢》中得以充分体现。扶桑两岁丧母，被父亲“出租”给一对乞丐夫妇开始流浪乞讨，后被拐卖到偏远农家给他们的傻儿子当媳妇，被囚禁一年，直到生下儿子才重获自由。扶桑对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失去希望，于是把两岁的儿子带出村子送给人贩子，她天真地以为孩子会被卖到好家庭，却不想孩子已沦为乞儿，重蹈她童年的悲剧。然而扶桑抛弃儿子的根本原因是报复囚禁她的婆家，她未能正确认识自己身上的多重伦理身份，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孩子母亲的身份，选择了“冤冤相报”的错误伦理立场，复仇的欲望让她作出冲动而轻率的非理性决定，造成母子分离的家庭悲剧。扶桑意外遇见遗失的儿子后，就是否赎救孩子与宜兰产生激烈冲突。宜兰认为此事与代孕合约无关，因此拒绝赎救孩子，于是母爱的天性驱动扶桑身上的自由意志再次任性发挥，她爬上餐桌威胁宜兰拿出赎金：“如果你不答应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 (Li, “Prison” 130)。扶桑与宜兰夫妇进行代孕交易，违反了国家法律；代孕期间拒绝履行合同，违背了契约精神；而拿腹中胎儿的安危来要挟宜兰，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生命伦理。扶桑的一生充满了错误的伦理选择，这些非理性的伦理选择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人生，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伦理警示。

四、李翊云对小人物群像伦理境域的“存在之思”

Horizont（境域）是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¹，指的是“某一个别对象或行为得以产生的整体和背景”，胡塞尔把“境域”理解为“理论直观行为的背景”，

1 九十年代出版的译著中 Horizont 多译为“视域”、“界域”，但“视域”暗示以目光为视点的“外界”，用来形容抽象主体在意识层面的场域不够妥切，“界域”则缺乏“无限伸展之可能”的哲学意义，因此有学者译为“境域”，参阅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附录“重要译名对照表”，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海德格尔则把“境域”理解为“日常实践行为的前提”¹。在此，笔者将“伦理境域”界定为道德主体日常实践行为产生的伦理环境、道德主体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其作出的伦理选择，伦理境域中的伦理环境、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相互之间构成一个互为因果、循环延伸的意识场域。

社会由独立、个体的人构成，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不在于刻画个别人物的生活情境，而在于陈述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李翊云对社会转型中小人物群像伦理境域集合性描绘的意义在于：从不同侧面折射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复杂的社会现状和百姓的生活现实，并且探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通过客观再现小人物群像的伦理境域，李翊云的小说首先映射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分化严重的现象。在《多余》中，代表穷人阶层的抢劫犯、代表平民阶层的林奶奶、代表中产阶层的老唐一家、代表富人阶层的美美贵族学校的校董和家长，不同社会阶层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差距极大，各阶层间的“层际关系”紧张，人际关系疏远；而《柿子》中的悲剧则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冲突激化的集中表现。其次，李翊云的小说反映了社会转型中道德滑坡的普遍问题。《玩笑》、《多余》等小说中多处描写的偷盗和抢劫事件，《儿子》、《囚牢》等小说中的拐卖妇女、买卖儿童和乞儿行骗等现象折射了治安不良、诚信缺失、拜金主义等社会弊病。再次，李翊云的小说还展现了改革开放中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价值观混乱和信仰危机等负面影响，随着人们对物欲、金钱、名力和权力等的追求日益增加，人们的情感日趋疏离，心灵日渐空虚。

李翊云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立体、丰满地展现了社会转型中平凡小人物所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及其不同的伦理选择，体现了她对生命状态呈现、人生际遇变化、世界存在方式的思考，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崇高的道德理想。作为远离故土、移民美国的作家，李翊云对中国转型期社会变革的观察与思考是一种隔着时间和空间双重距离的深刻反思：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克服社会在急剧前进、高速运转中所引起的价值观的混乱和迷失？如何处理好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交流碰撞时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呈现的社会伦理境域是否可折射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曾经的历史，或者能启示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见的未来？

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观中，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人是自由的，可以自主地作出任何选择，只要他为其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自由度越大，则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存在主义哲学“用行动说明人的性质”，“它把人类的命运交在他自己手里”（萨特 16），而且“在行动的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萨特 26）。因此，萨特认为人在一生中不断进行选择，人的各种境遇迫使其必须作出各种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人“在自己承担责任的同

1 参阅彭立群：“海德格尔的‘境域格式’概念解析”，《复旦学报》6（2010）：67-73。

时，也使整个人类承担责任”（19）。困境和选择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母题，这是作家对“人”作为“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展现，是对存在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生”、“世界”、“存在”、“意义”、“价值”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 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翊云的写作超越了书写当代中国社会中普通小人物生活状态的特殊性，而是已经上升到探讨“人”作为“人类”的普世性存在及其价值，提供“人”作为“人类”的道德经验与道德指引，体现了作家超越族裔性写作的创作倾向。

结语

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和《金童玉女》展现了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小人物群像的伦理境域，塑造了小人物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引和深刻的道德警示。李翊云声称自己不喜欢在小说中塑造英雄式人物，她对描写人生中的灰色地带情有独钟，尤其热衷于描绘处在灰色地带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她坦言：“如果我写美国的故事，也会是同样的情况。我不会写美国多么阳光多么现代，我还是会写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Evans 7）。李翊云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多有性格缺陷，但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他们在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中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常常被命运之手推向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是传统与变革间社会转型的牺牲品。通过客观描摹不同伦理环境下的小人物所面临的生存、身份和精神层面的伦理困境及其作出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伦理选择，李翊云向世界读者展现了当代美国新移民作家如何对母国文化和历史进行澄明的“存在之思”，如何以跨文化视角和世界公民意识对不同文化生态中的政治、权力、变革进行思考，如何对孤独、疏离、焦虑等人类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个性化表达。此外，李翊云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北美新移民作家的英文小说如何理性地正视和面对人类性格中的瑕疵，折射出重要的伦理教诲价值。

同时，李翊云集中书写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剧人生既是目前其作品中的鲜明特色，也不免成为其文学创作中的某种局限与瓶颈。社会症结、人生变幻、命运无常，这些毕竟只是时代奏鸣曲中的一个声部，如果过于强化和突显，势必无法让人听到完整、立体、丰盈的乐章。作为自小成长在美国的美国新移民作家，李翊云以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为题材，并通过英文书写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无论作者如何自我辩护，始终难免被读者和评论界误读或者故意误读。而这些误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可能违背甚至歪曲作者原本纯粹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初衷。当然，李翊云的创作才华与写作技巧绝对无可厚非，毕竟她的写作生命还很长，我们也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以包容、乐观的心态期待她更加优秀的作品，迎接她更加绚丽的未来。

【 Works Cited 】

- Evans, David. "Shades of Gre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Sep 2008. 7.
- 胡发贵: "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作用的变迁", 《学海》2(2002): 149—151。
- [Hu Fagui. "The Changes of Moral Function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Academia Bimestris* 2(2002): 149-151.]
-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5(1992): 3—17。
- [Li Peilin. "'Another Invisible H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1992): 3-17.]
- Li, Yiyun. "After a Life."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23-43.
- ."Gold Boy, Emerald Girl." *Gold Boy, Emerald Gir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204-221.
- ."Prison." *Gold Boy, Emerald Gir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101-130.
- ."The Princess of Nebraska."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68-91.
-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186-203.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乔治·摩尔: 《伦理学原理》, 长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 [Moore, George Edward. *Principia Ethica*. Trans. Chang H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 [Satre, Jean-Paul.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Trans. Zhou Xuliang and Tang Yongku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杨桂华: 《社会转型期精神迷失现象分析》。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 [Yang Guihua. *An Analysis on the Spiritual Los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ianjin: Nankai UP, 2009.]

责任编辑: 舒 昕